

# “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藏家张伯驹》主人公人格魅力

张剑桦

(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 广东 广州 510830)

**摘要:**《大藏家张伯驹》这部传记文学,充溢着主人公张伯驹的人格魅力。他气节之高古,胸襟之坦荡,民族之情感,爱国之热忱,足为世人所景仰。他擅长诗词,热心京剧票友,嗜好法书名画,潜心古董收藏。他蔑视权贵,性情嫉恶如仇,禀赋不畏强暴,奋力保护国宝。他忘我奉献,不幸沦为右派,多年谪居吉林,最终“迟到发现”。

**关键词:**张伯驹;是真名士;自风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6)-05-0048-07

刘军、柯建刚传记文学《大藏家张伯驹》,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人格魅力。张伯驹是一位卓尔不群、嵒崎磊落的文化名人。其气节之高古,胸襟之坦荡,民族之情感,爱国之热忱,足为世人所景仰。《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史湘云那句“是真名士自风流”,借来概括张伯驹人格魅力倒有几分道理。自古以来,风流名士有许多,以业绩而名者,以才华而名者,以性情而名者,以行径而名者,以仪态而名者,各得其所。无论因何而名,风流作为一种洒脱飘逸的处世方式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学士孜孜以求的境界,有人得之皮毛,浅浮至画虎类犬;有人得之精髓,深刻至万众影行。真正高雅的人物用不着装扮做作,其一举一动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超俗洒脱的高品位来。大藏家张伯驹的悠悠人生路,诠释了“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内涵。

张伯驹(1898—1982),男,河南项城人,生于宦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为“民国四公子”。他是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搜藏鉴赏

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红学家周汝昌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的人也少少的。”文物鉴定家史树青说:“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大藏家张伯驹》洋洋大观,32万字,时空跨度较大,书香味道浓烈,文化气息浓厚,尤能紧扣主人公生平事迹,凸现了张伯驹的人格魅力。

一、张伯驹爱好广泛,除了是围棋高手和美食家之外,还喜欢诗词、戏曲、书画、古董,而且在这些方面的造诣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人称他为“京城玩主”,但他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尊严

收稿日期:2016-04-25

作者简介:张剑桦(1953-),男,河南许昌人,广东培正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擅长诗词:张伯驹一生填词数千首。出版有《丛碧词》、《张伯驹词集》等。周汝昌为《丛碧词》写跋说: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周汝昌把张伯驹与李后主相提并论,而且坚持这一观点“死不悔改”。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张伯驹词集》,周汝昌在其序中仍然旧话重提。可见他把张伯驹的词摆在何等崇高的地位。在西安,少帅张学良的官邸有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乃张伯驹所写。“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大藏家张伯驹》第十一章,下引只标章数)当年周恩来在张学良官邸见到这个条幅,非常欣赏这段文字和怪怪的字体,问及何人所写,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了周恩来。这里,再以张伯驹的好友陈毅元帅1972年1月6日逝世,张伯驹为其挥毫撰写的挽联为例,足见其词学功底之一斑。上联:倚剑从云,做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下联: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第十四章)七十二个字,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含了深深的爱,更含了沉甸甸的情。这幅挽联好出色的文笔!寥寥几十字,生动准确地勾勒了陈毅的一生,用字讲究,余韵铿锵。毛泽东看了之后说:“这幅挽联写得确实太好了!”张伯驹词学造诣得力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博览群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

京剧票友:张伯驹是京城著名票友,北京戏剧协会的重要赞助人。他曾拜京剧大师余叔岩

为师。整整十年在余叔岩门下潜心研究余派艺术。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客串演出《空城计》,出演主角诸葛亮。余叔岩、杨小楼、程长庚、王凤卿、王福山等大牌名角为他当配角同台演出,北京城为之轰动。抗日战争期间,张伯驹还到西北重镇兰州去搞过义演。张伯驹上演《空城计》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是用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对时局的看法,表达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且看,“接下来,周围的灯光暗了,台上的灯光聚拢了,诸葛亮上场,四击头锣鼓亮相。自报家门,定场诗念过,便是一段纯正的余派老生唱腔: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连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台下一阵叫好。诸葛亮继续唱道: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往西行/一来是马谡无谋少才能/二来是将帅不和失街亭/你连得三城多侥幸/贪得无厌又夺我西城/诸葛亮在敌楼把驾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谈心/西城的街道打扫净/预备着司马好屯兵……戏演完了,宋哲元亲自带着众名流官佐上台,并亲自送了张伯驹一幅大字: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第六章)然而,谁都知道,谁都能品得出,张伯驹主演《空城计》是在揶揄谁,讽刺谁,鞭挞谁。在这一场《空城计》中,张伯驹实在埋伏了太多的东西。用心之诚苦,多少年之后,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法书名画:张伯驹临摹过书圣王羲之的《十七帖》,练过草书,临摹钟太傅的《贺克捷表》,练过楷书,最后从反复摩挲玩味蔡襄的《自书诗册》中获得书法真谛,创造了自己似蔡非蔡的独特字体。该体不愠不火、不激不励,落笔时露峰、收笔时藏峰,启承转合无一败笔。1980年,北京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轰动海内外。1981年初,继北京之后,香港书画界又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张伯驹对中国传统书法理论中的“六法”、“六长”、“六要”、“十八描”等,如

数家珍,颇为精通。张伯驹又精通中国传统画论。他看了夫人潘素画的《锦绣河山图》,极其专业地娓娓道来:“大凡绘画,最忌三病。一忌曰‘板’,腕若笔痴,全亏取与。状物平扁,不能圆浑,使人望之一团死气。二忌曰‘刻’,运笔中疑,心手相扯。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使人望之全无底蕴。三忌曰‘结’,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畅流,使人望之有堵塞之感。这三样,是画之大忌。……具体到山水画,可说有十二忌,一忌布置迫塞,二忌山无气脉,三忌远近不分,四忌水无源流,五忌境无险夷,六忌树少四枝,七忌路无出入,八忌石仅一面,九忌人物佻倭,十忌楼阁错乱,十一忌滃淡失宜,十二忌点染无法……另外,中国之山水画有‘三远’之讲究,自下仰上,谓之‘高远’;自前窥后,谓之‘深远’;自近望远,谓之‘平远’。好的画,讲究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这些,都是古来评论画品的尺度。”(第八章)张伯驹谈起传世的名画如唐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的劲细、浓丽、万象不失;李思训《红帆楼部阁图》卷中“豆马寸人,须眉毕露”的工巧;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的“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周仲郎《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的“水月观音,端庄柔丽”;韩干《牧马图》的“骨肉停匀,色人缣素”,韩滉《五牛图》的“曲尽其妙,笔诉田原”……滔滔不绝,头头是道。

古董收藏:张伯驹堪称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收藏家和古董鉴赏家之一。对于珍稀字画、书籍、陶瓷、木器,张伯驹都有极高的鉴赏力。比如,《大藏家张伯驹》作者之一刘军带了一幅郑板桥《竹石图》,让张伯驹鉴定。“他把这幅画远远近近看了一番,摇摇头道:‘不真,不真。手法倒是很像了,可还有毛病。你再仔细看看这一笔,显然底气不足,分明是怯了!……心中无定,下笔游疑,欲行不行,欲止未止,是为‘怯’。大凡伪本,难脱此弊。’‘板桥作画,书味最足。但写兰竹,常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

峭。虽寥寥几笔,却是最难仿的。另外,这题画诗,亦可见尴尬。板桥书法,用隶书参入行楷,独成一脉,号‘六分半’书,即源于此。这一幅,只学得形似,神韵则分明不足。所以说,不真。”(第十四章)他的藏品以古代字画和善本图书为主。他的收藏方针是贵于精而不在多。譬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中国画。张伯驹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慈禧太后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的住宅)卖给辅仁大学得200两黄金,又加上变卖夫人潘素的首饰凑足220两黄金而买回。据不完全统计,张伯驹收藏的古字画,约有20件。借用张伯驹写给夫人潘素的遗书上的话,即:“计开:晋·陆机所作之《平复帖》,隋·展子虔所作之《游春图》,唐·李白所书之《上阳台》,唐·杜牧所书之《张好好诗》,宋·蔡襄书《自书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黄庭坚书《草书诸上座》,宋·赵佶画《雪江归棹图》,宋·马和之《节南山之什》,宋·杨婕妤《百花图》,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元·《五家合绘》,明·陈叔起、王祓合作《潇湘秋意图》,明·文徵明《三友图》,明·唐寅《仕女图》绣品三件……”(第十章)

**二、张伯驹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从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在古董市场享有盛誉。他对奸商、权贵、以及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变卖国宝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深恶痛绝**

藐视权贵:抗战时期,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与蒋经国同桌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堂而皇之地在首席就坐,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凭什么有如此大架子?”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圆场,他自己倒抢先回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此言发出,祝绍周的脸都吓白了。倒是蒋经国颇有肚量,心中暗想:“文人狂生,不与他计较也罢。”再如,日本奸商荒木铤一向老太监卫福海打听张伯驹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卫公公比画着说道:“记得民国三

年,老袁建立了专为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这位张爷刚十七岁就考上了。穿着蓝呢制服,入骑科,神气!挺风光的事吧,偏就不乐意按规矩走,截长补短儿地请假回家,谁也拿他没治。就这,他竟然自称是个‘优秀的渣子’。民国四年,他父亲嘱咐他到北京,给他姑父袁大总统拜年。大总统在居仁堂见了,一聊就是半天儿。等我们这位‘渣子’到家,老袁的礼物已然先到,包括金丝猴皮褥子两副,狐狸皮、紫貂皮衣各一套,书籍四部,食物四包。大总统给的东西,要在别人,怎么也得喜欢一阵子吧。人家不,一转身,就把东西全给了人!……听人说,前些日子在西安,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请客,只因一句话没说到妥当处,张伯公怒得连桌子都掀了。换了别人,敢吗?”(第七章)张伯驹对待中共党内大人物康生也不给面子。康生请他出来筹办现代戏剧创作小组,并宣称这是一个“机会”。三天后,张伯驹给康生的回信中表明“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另择高明”。

嫉恶如仇: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王羲之、王献之与王殉三人的字帖《三希堂法帖》献给宋子文。宋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买下他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郭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张伯驹闻讯,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发表于上海《新民晚报》,以生动翔实的文字说明故宫失散书画的去向和《三希堂法帖》的遭遇,在上海文化界引起轰动。蒋介石风闻此事,对宋美龄抱怨:“子文也太不知轻重了,身为国家大员,为了两幅字闹得物议沸腾,坏了政府的威信。”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大汉奸殷汝耕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以“投其所好”来拉拢张伯驹,并派人给张伯驹带去一些书画。张伯驹深知日本走狗殷汝耕的卑鄙行径,火冒三尺,一扫平时温文尔雅,露出金刚怒目,甚至爆了粗口。“‘殷主席这是想把列祖列宗、亲娘老子都一起卖给日本人呢,这会儿倒说起立

身成命来了,就不怕貽笑大方?伯驹虽然不才,当今国难当头,可还不至于干这种给东洋人舔屁眼儿的事!’……第二天傍晚,这个军官把小匣子交到了张伯驹的手上。张伯驹打开一看,里面没有只言片语,只有五粒闪闪发亮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子弹。慧素(张伯驹夫人)见状,花容失色,惊得叫出了声。‘殷汝耕玩这一套,其实是最无能的了。’张伯驹含笑说道,‘凭他这么一个人多枪多的殷汝耕,真要想杀我,根本不必费这么大的心思,派个杀手来就行了。不过,我相信他不敢!殷汝耕这种人,在我张伯驹面前,不过是条走狗,一条只会叫一叫的乏走狗。’(第四章)

不畏强暴: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南下上海。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莱害怕少东家查出他贪赃枉法、私营舞弊的劣行,勾结日伪特务在培福里弄堂口将张伯驹绑架,关在一个废弃的农家小院里,号称没有两百根金条就撕票。张伯驹绝食抗议,不进水米。有人给他夫人潘素传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把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卖掉救人要紧。潘素断然拒绝,说“伯驹把《平复帖》看得比生命还要紧。卖掉它,伯驹回来我没法交代。”最后,张伯驹的朋友孙耀东通过周佛海打通关节,终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张伯驹。这就是“旧社会”的张伯驹——铁骨铮铮、视国宝胜于生命的爱国人士和才华横溢、潇洒自在的京城玩主。尊严是做人的第一要义。

保护国宝:与别的古董收藏家不同,张伯驹收购古字画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将它们藏之于密室,待其升值之后再捞一大把。他担心的主要是这些稀世珍宝落到洋人手里、流入外邦。“张伯驹最恨的是国粹外流,只要不是被洋人弄去海外,在国人谁的手中,却是无所谓的。”(第四章)在张伯驹看来,“所谓‘历史的责任’分明异常地沉重。他能觉得出,对他来说,《平复帖》已经不属于身外之物了。为了这件东西,他必须牺牲一些什么,承担一些什么。他不会因‘玩物’而‘丧志’,却愿意为这件东西付出自己。”(第七章)张

伯驹为保护国宝,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劳顿之苦,“五月,时局更加危急了。张伯驹生恐国粹难保,便同慧素一道,将所收藏的字画一律将画轴拆去,装入箱中,一共装了五大箱,趁夜装上火车,发运到河南漯河。然后,二人坐火车到了河南漯河。为防外人注意,张伯驹专门请了几个农夫,雇了一辆马车,将五箱东西分成五次,陆续运到了项城的老家中。在项城,张伯驹家有一个很精致的庄园,是祖上传下来的。庄园中,有一个大的地窖。张伯驹把其中几十件珍品选出来,用油布层层裹了,放到箱子里,又在四周放上了隔潮的石灰和木炭。箱子外面,又用熟桐油刷了七八遍。然后,夫妇二人又亲自动手,在地窖之中又掏了一个坑,把箱子埋了进去,周围夯上了三合土。其余的,因为太多,便藏在了地窖之中。等到把这些东西全部安置完了,夫妇二人才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第七章)人们还记得张伯驹曾对夫人极为庄重、感人至深的话语:“慧素,你要记住一件事,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我死了,也不许卖《平复帖》。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平复帖》虽然在我们手上,但是,它不属于我们。”(第八章)人们还记得张伯驹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的一段有关国宝文物“七次浩劫”对谈,令人痛心疾首。“说到这里,他身子猛地一转道:‘马院长可知道,一千四百年前的承圣三年,梁元帝萧绎困守江陵,被西魏的于谨攻陷。失守前,萧绎派舍人高善宝,将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典籍共计二十四万卷,付之一炬的事?’马叔平连道:‘是,是。’张伯驹又道:‘这可谓珍贵书画的第一次浩劫。一百五十年后,隋炀帝杨广巡幸江都扬州,随身带了一大批名书名画。不想中途船只沉没,所余无几。此当为中国书画经历的第二次浩劫。未久隋亡,李世民命司农少卿宋遵贵,将两宫珍藏的大批书画以船送往长安。其本意为珍藏,却不想船竟在三门峡颠覆,全部书画尽被江水吞没,实在令人叹惋。此可谓第三次浩劫。’马叔平接道:‘大唐武则天执政,内府薛稷惧

怕武后之严刑峻法,将从张易之处所得的大批书画尽行焚毁,当为第四次浩劫,对吗?’张伯驹点点头道:‘第五次浩劫,则因安禄山作乱,李隆基奔属,皇宫内库大批珍贵书画为番兵所毁。第六次么,当数是靖康之变,金兵攻陷宋朝都城汴梁,使得内库珍藏的书画损失过半。所幸此后的八百年,倒没有太大的损失。’‘接下来,恐怕就是轮到大清国覆灭前后,宫内大量珍贵字画的流失了。’马叔平说话的声音显得特别沉重。张伯驹说话的声音高了起来:‘算起来能称得上第七次浩劫的,确实应当数逊帝溥仪这一次了。可惜啊可惜。这一次一下就流失了一千多件,其中多为数一数二的国之瑰宝。马先生,真让人心疼啊!’”(第十章)

**三、张伯驹身历民国一直到社会变革的八十年代初期,不同时期有不同境遇。他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曲折,痛苦与欢乐,不断地矫正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对民族和国家始终怀有一颗赤胆忠心**

忘我奉献:“‘张伯驹到文化部上班了!’这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向张伯驹道贺,他自己也觉得好像年轻了十岁。他开始热爱——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儿,他也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本就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发现并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广泛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能多干一点儿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第十一章)早在1952年,我国为“抗美援朝”进行全民动员捐献活动之际,张伯驹就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寅的《三美图》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献给了国家。1955年底,国家发行公债,开展购买爱国公债的全民动员,张伯驹把晋·陆机《平

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等无偿地捐给国家。当时，文化部部长办公室里，部长沈雁冰拿着一封信，声音颤抖地念着张伯驹写的信：“……伯驹亲历四十年之风云战乱，目睹大波之迭起，终知今是而昨非。老骥残躯，不解主义，然眼见新中国建元仅七载，吏治蒸蒸，民心归颂，有口皆碑。伯驹无能，唯恨不能登高一呼，狂歌我民族光大之精神。当此举国鼎力建设之际，经与夫人潘慧素商议，决定：将多年收藏中国古代文化之书画十三件捐献与国家，以披示心迹……”（第十一章）张伯驹夫妇把多件珍藏的十三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当时，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一时间，国内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那三万块钱，张伯驹坚辞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去买了公债。张伯驹感喟地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沦为右派：张伯驹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是因为得罪了“大野心家”康生。康生一次到张伯驹家探访，看中蔡襄《自书诗册》，一心想据为己有。张伯驹慷慨大度，名声在外，康生以为只要稍加“启发”，张伯驹就会把它送给他。没想到他反复“启发”，张伯驹都启而不发。康生以“借”为名，借而不还。后来陈毅夫人张茜把此事告知周恩来。康生以为张伯驹在总理面前告他的黑状，从此对张伯驹怀恨在心。反右斗争一开始，康生就向北京市文化口和北京市民盟打招呼，要注意张伯驹的动向。在权势显赫的康生看来，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不收拾他，怕是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康生）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吗？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乏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第十一章）

谪居吉林：新中国成立以来，张伯驹就谨小慎微地度日。他响应关于旧知识分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号召，反复告诫自己，要注意改造思想，莫耍公子脾气。在莫须有当上右派以后，他更加言行谨慎，连自己为什么被定为右派都没有打听。1960年，陈毅通过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把张伯驹夫妇调到吉林省博物馆任第一副馆长。虽然不知何罪之有，张伯驹仍以“带罪之身”开始在吉林加倍努力地工作。吉林地处关外，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省博物馆的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相比。张伯驹慷慨解囊，又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包括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唐人楷书书册，宋·赵伯喈《白云仙乔图》卷、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卷，元·仇远《自书诗》卷、颜辉《煮茶图》卷，明·薛素素《墨兰图》轴、董其昌的字对等等。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对吉林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甚为遗憾。张伯驹闻言又捐献了宋·杨婕妤《百花图》。张伯驹的勤奋工作和倾囊捐献，只让他过了几年平静日子。“文革”一开始，张伯驹夫妇就成了“牛鬼蛇神”。在关押八个月后，被发配到舒兰县农村去劳动改造。大卡车把他们夫妇扔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一溜烟地开跑了。在数九隆冬、北风呼啸的严寒里，张伯驹夫妇在一间废弃的茅棚中相对无眠地熬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牙一咬、心一横，自作主张地返回了北京。就这样，在北京住了大

半辈子的张伯驹,在北京成了“黑户”,在没有粮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证的情况下艰难度日。

“迟到发现”:陈毅元帅逝世时,张伯驹那副挽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把周恩来叫到身边,让“过问一下,尽快解决”。几天以后,章士钊就派专人把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送上门来,当地派出所所长和户籍警也上门为张伯驹夫妇办好了北京户口。“四人帮”倒台后,张伯驹成了大忙人,再次被“礼为上宾”。一时间,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这是一种“迟到发现”。然而,张伯驹对自己遭受的劫难并没有耿耿于怀,居然不计前嫌、泰然处之。他说:“想想陈帅,人家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

《大藏家张伯驹》的文学性较强,乃记载人物经历的传记文学作品。它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通过人物生平和业绩刻画了张伯驹的精神风貌。张伯驹是举世闻名、不可多得的文化名士,《大藏家张伯驹》为主人公营造出浓烈的书香气息、厚重的文化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怀着对张伯驹无限景仰心态而写成的,字里行间,

窥见一斑。明代茅坤评价司马迁《信陵君列传》时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无疑,张伯驹是作者刘军、柯建刚胸中的“得意人”,难怪写出了《大藏家张伯驹》这样的“得意文”。尤其作品的尾声部分,作者有幸直接与张伯驹近距离接触、“共事”,增加了作品的资料上的可信度和阅读上的亲切感。文学作品包括传记文学,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旨归。文学作品是与陌生人对话的一种方式,人们阅读《大藏家张伯驹》的文字单元,会体悟到张伯驹人格魅力四射:一无所有却不自卑懊丧,家财万贯却不得得意忘形;万般痛苦却能自制不惊,万分欣喜却不形于色;千钧一发的紧张却能从容不迫,繁忙杂乱却又心闲自在;家常无米下锅,却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白雪纷飞却不乱,大雨滔滔水自流;丸之走盘,横斜竖直,却又终不出盘。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变化万千,不拘一格,却又合乎声律规则,不做作,不雕琢,不声嘶力竭,却又能给人清新印象。所谓人格魅力征服人,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注释:

文中引文均出自刘军,柯建刚.大藏家张伯驹[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